《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二期
2008 年 6 月　　頁 1-26

試圖與日本近代文學接軌，反思國族論述下的張文環文學活動

曾秋桂
淡江大學日文系教授

中文摘要

依據國族論述的觀點，檢視張文環的文學是否為皇民文學，的確有其正當性以及必要性。然太過於拘泥於此，恐怕少有建設性的發現。於是，先正視張文環豐富留日經驗，且其小說作品中投射了許多日本近代文學作品的事實，得知如下的結論。

張文環有別於其他台灣文學家，張文環也和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石一樣陷入極度的跨語言、跨文化書寫的苦惱之中。為了突破困境，張文環嘗試以日本人寫作為參考，如實地寫出自己生活點滴。歷經〈懷念平林彪吾〉的雜記與小說〈父親的要求〉仔細比對後，可以確定的是張文環留學東京居住本鄉時，應該看過漱石文學作品或《漱石全集》。日語化繼而日本化，可謂一九四〇年代之前張文環努力朝向的目標。

而一九四〇年代如火如荼地推展的皇民化運動中，張文環以媒體公眾人物的身分，確實適時適地的配合推展，宛然以皇民擁護者的姿態出現在各式公共場合，發表支持皇民化言論。然而對照戰後立即對日本帝國主義毫不留情地批判，以及皇民運動中堅持不改姓名的作為，張文環應該除了公開擁護皇民運動之外，內心自有另外主張。洞察張文環言談間，發現張文環不斷強調人格、修

2008 年 3 月 6 日投稿；2008 年 5 月 12 日審查通過；2008 年 5 月 30 日修訂稿收件。

為、自我批判精神以及台灣獨立的重要。由此不難看出張文環的真情流露與真正的主張，亦即張文環為透過皇民化改造、提升台灣人民素質與台灣文化臻於近代化。

時代洪流之下，台灣走過日本帝國的殖民。身為被殖民一份子的張文環於巨變的洪流當中，雖有不同風貌的展現，但唯一不變的主張，即是張文環想承襲日語化進而日本化，繼之皇民化而迎向台灣的近代化一貫主張。此乃是跳脫出皇民文學與否的國族主義論述，與日本近代文學接軌後，獲得的是對張文環文學活動重新詮釋與評價。

關鍵詞：日語化、日本化、皇民化、近代化、國族主義論述

In An Attempt to Contact with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 Revalution of Zhang Wen-Huan's Literary Activity from Nationalism

Tseng Chiu-Kue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o observe from the point of nationalism, it's not only sensible but necessary for us to survey on literature of Zhang Wen-huan as the Kou-Min-Ka literature. If we simply view from this theme, perhaps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have a constructive discover about Kou-Min-Ka literature. Then, this research faces the Zhang Wen-Huan's experience of studying abroad in Japan. Also,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many literary works in Japanese modern age are projected in his novel works. Thus, we can come to the conclusion as following.

Zhang Wen-Huan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Taiwanese writers. He suffered in the same way as Natume Souseki who fought with two languages in Japanese modern age.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Zhang Wen-Huan wrote out the sketch of his own life in real fact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as a reference.

In 1940s, during extreme Kou-Min-Ka movement, Zhang Wen-Huan, a celebrity, acting as a supporter, appearing in the public and announced for supporting opinions. However, Zhang Wen-Huan always emphasized the personality, behavior, spirit of self-criticism and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He claim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es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aiwan culture through the Kou-Min-Ka movement.

Zhang Wen-Huan aimed toward Kou-Min-Ka movement by learning Japanese. Consequently, through the Kou-Min-Ka movement, he tried to aim toward the Taiwan modern times. His attitude and insistence was consistent.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at Kou-Min-Ka literature by separati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nationalism. In this way, we can revaluate to the literary activity of Zhang Wen-Huan from viewpoint of the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Localizing into Japanese, Kou-Min-Ka movement, modernization, nationalism

試圖與日本近代文學接軌，反思國族論述下的張文環文學活動

一、前言

台灣文學史學大家葉石濤先生在接受日本教授山口守訪問中，曾提及相對於楊逵、龍瑛宗兩位台灣文學作家，張文環的文學是具有極大的空間再重新接受評價[1]。不過，葉石濤先生並同時毫不掩飾地指出，張文環文學再接受重新評價的關鍵，乃在於張文環的文學能否通過不被貼上皇民文學擁護者標籤的大考驗[2]。

由此可見，涉入皇民文學深淺的程度，是和其文學被評價的高低成一定的比例。皇民文學與否，往往成為台灣文學論述中的一個重要的二分切割法。對於依此基準來為台灣文學家的文學價值定位，日本學者藤井省三[3]先生、垂水千惠女士[4]皆不以為然，認為是無謂之爭，也毫無意義存在。的確，皇民文學與否，對於統治者日方、日方研究者而言，或許不是那麼直接攸關生死的大問題。但

---

1 山口守，〈專訪葉石濤〉，《文學台灣》第 62 期（台北：文學台灣雜誌社，2007 年 4 月），頁 76。

2 同上註。

3 藤井省三，〈〈大東亞戰爭〉時期的台灣讀書市場的成熟與文壇的成立——從皇民化運動到台灣國家思想間的歷程〉，該論文收編於下村作次郎、中島利郎、藤井省三、黃英哲編，《甦醒的台灣文學——日本統治期的作家以及作品》（東京：東方書店，1995），頁 102。文中提到用抵抗還是投降的視點來分類支持戰爭的皇民文學，是個毫無建設性的論爭。

4 垂水千惠，《台灣的日本語文學》（東京：五柳書院，1995），頁 57-58。文中提到台灣文學中的皇民作家問題的糾葛，就好比是日本近代文學中與西歐文明對峙問題的糾葛情形一樣。同時發表了若能跳脫此狹隘的二分法方式的論述，即可從中得到解放，飛奔至更寬闊的視野。

是對一個被殖民的台灣人民而言，此正是攸關台灣主體性的大問題。於是，在台灣國族主義論述中，若是皇民文學的話，其價值馬上就受到質疑。若是非皇民文學的話，則被推崇、被歌功頌德。

縱然如此，若只在乎台灣國族主義論述中為皇民文學與否的話，常常會因為「非黑即白、非白即黑」式的二分法，而漠視生活在日本殖民帝國威權之下，人民以及知識份子真正的心路歷程。於是，本人對此二分法的區分方式，是持以保留的態度。

在洞悉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二分法的窒礙、侷限之大後，本論文擬跳脫此二分法的框架，忠實地回歸張文環本身的論述、創作。特別是著眼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間張文環留學日本[5]及其小說作品中投射許多日本近代文學小說作品的兩點事實。試圖與日本近代文學接軌，來深究張文環建構文學的理念及張文環文學形成的歷程。最後再就綜合考察的結果，來反思國族論述下，張文環文學活動的真正意義。

二、張文環的文學創作之路

張文環的處女小說作品〈落蕾〉，在日本留學期間發表於東京發行的同仁雜誌《福爾摩沙》當中。張文環曾在〈荊棘之道繼續著〉[6]中提到，中學時期雖然喜歡文學，因為日語艱難，從未夢想從事文學。又於〈我的文學心思〉[7]中，提到自己原本想當老師，孝順父母，卻不知為何地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即使如此，張文環還是走上了文學之路，但在從事日語創作時，張文環意識到日語語言表達上的困難處[8]。例如自日本返台之後，張文環曾經感慨地在〈獨特的存在—今

---

5 依據柳書琴整理的〈張文環生平寫作年表〉，收於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第 8 卷（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頁 122、127。張文環曾自云小學一畢業決定到東京去，見〈小學的回憶〉，《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49。

6 《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62。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興南新聞》（1943 年 8 月 16 日），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7 同上註，頁 164。

8 此點與鹿子木龍在〈作品和文章——關於散文水準的提昇〉一文當中陳述的見解，不謀而合。該論者點出此乃外地作家中常見的問題，原因歸咎於「無法完全掌握日語所致」。資料引用自《張文環全集》第 8 卷，頁 43。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文學》（1942

年也要奮鬥〉一文中表示：「尤其從事文學的本島人和內地人相比，我想更需要有二倍三倍的心得才行，首先要征服言語的運用，不然就沒有表現的手法可言」[9]。發表生平第一篇長篇小說《山茶花》的預告文中，也毫不掩飾地表示「描寫舊式鄉下生活，最為痛苦的事，無法盡情用日語表達出來」[10]。同樣語意，在〈論台灣文學的將來〉一文中，又再次強調[11]。其中更具體地舉出兩個例子，說明他本身的深刻體驗。

> 譬如我們說「她放聲大哭」這一句日本話時，如果是日本人，會比我們更快又正確地抓取來應用。同樣說「櫻」這一個字，內地人會比我們快又直接的反應感受。（中略）在文章的構成上，我們實在不得不造成很大的損失[12]。
>
> 我們要描繪台灣的生活時，最感到痛苦的事，是把實際生活搬上文章時的筆者的感覺，跟內地人有其不少的差距，而難以迅速執筆[13]。

由上述的體驗，可以看出台灣人張文環，因無法像日本人一般隨心所欲地使用日語表達自己的想法而感到苦惱。其實這種情形在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石（1967～1916）的身上也可看出。漱石在一九〇七年的〈未來的文章〉[14]談話中，有以下的論述：

年 10 月），中譯參考陳明台譯稿。

9 《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43。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新民報》（1940 年 1 月 1 日），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10 張文環，〈山茶花——後天開始連載・作者的話〉，刊載於《台灣新民報》（1940 年 1 月 21 日）。該文章以日文創作，中文翻譯為筆者所譯。引用自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監修，《台灣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 2》（東京：綠蔭書房，2002），頁 348。

11 《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47。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藝術》（1940 年 3 月），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文中提到「我們從事文學，要比內地人付出數倍的努力。這就是表現手法的問題」。

12 〈論台灣文學的將來〉，《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46。

13 〈我的文學心思〉，《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69。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興南新聞》（1943 年 8 月 16 日），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14 最新版《漱石全集》第 25 卷（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 220。原文刊載於《學生時報》2 卷 1 號（明治 40 年 1 月 1 日），中文翻譯為筆者所譯。

> 近來的文章書寫中，尚無法充分地表現出思想，在未來的日子中，必須更能夠且更容易表達出思想不可。我的腦筋一半是西洋，一半是日本。於是用西洋思想思考的東西，怎麼也沒辦法充分地用日語表達出來。這是日語中單字欠缺、說明方式不夠生動活潑所導致。相反地，用日本思想思考的東西，又無法充分地用英語表達出來。那是因為我本人的英語造詣不好。

以上兩位文學先覺者所共通感受到的，是跨語言、跨文化的言語表達之苦。雖然一為殖民地宗主國的語言，一為同盟國的語言，難免對於該語言的感情是不能相提並論。但兩位文學家在面對近代先進文化衝擊時，所產生的同樣反應是確實的。

主攻英國文學且留學過英國（1900～1902）的漱石，曾於留學期間陷入英語、日語兩種語言間表達困境之中。自一九〇〇年留學英國期間起，漱石所寫下的日記或隨手的紀錄[15]、筆記[16]中，皆可看到用英、日語並陳，明記下自己想法、構思的方式。當然例如在《倫敦日記》中，亦不乏對此英日同盟國的英國這個國家的民族性或習慣諸多批判。然漱石的確是利用此模式，企圖克服跨語言、跨文化的言語表達困難。漱石除了注意到語言表達的課題，亦嘗試英、日語並陳、英文式的方法，歷練自己的語言表達，創造出影響後世的日語小說的書寫方式[17]。學者小池清治教授甚至表示漱石之所以流芳後世，並非僅是他傑出的文學作品而已，確立並完成了現代日語書寫表達方式的豐功偉業，更是值得推崇[18]。此見解亦獲得日本著名小森陽一等學者們普遍支持[19]，使得漱石的日本近代文學文豪的地位，更是屹立不搖。

---

[15] 《漱石全集》第 19 卷（東京：岩波書店，1995）。

[16] 《漱石全集》第 21 卷（東京：岩波書店，1997）。

[17] 小池清治歸納出，確立了第三人稱視點的白話文體、小說中使用多重語言層構造、視點的重疊、外語直譯式的日文、擬人法等五點。詳見《日語是怎麼產生的？》（東京：筑摩書房，1993），頁 145 至頁 184。

[18] 《日語是怎麼產生的？》，頁 147。

[19] 小森陽一，《日本語の近代》（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 210、山田有策，〈文體的魔術師〉，《漱石與明治日本》（文藝春秋，2004），頁 20、吉本隆明，〈漱石的偉大〉，《漱石與明治日本》，頁 50。

另一方面，雖然不見張文環在留日期間，從事日語文學創作之初，有面臨任何跨語言、跨文化的言語表達所產生之苦惱時，留下透露出其中之心情紀錄的蛛絲馬跡。但從上述返台後，於一九四〇年所發表的談話中，可窺得張文環與漱石對於跨語言、跨文化的言語表達上的真知灼見之相近，誠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然而張文環所思索出的解決方案，不是像漱石一樣日語與母語並陳的方式，而是「在文章的道路上，可以拿內地人所做的來參考」[20]、「必須先將語言消化成為自己的東西」[21]。而具體的實踐方法，就如同甫自日本返台之初，張文環尚未謀得正職之前，於《風月報》擔任日文編輯時，不斷鼓勵讀者從事寫作，提出「以率直的心情，表現自己生活的原貌」[22]的概念。由此可見，張文環除了擁有對跨語言、跨文化的言語表達的真知灼見之外，亦自有一套脫困的方法。

身處於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當遇到較高水準的文化衝擊時，漱石以及張文環兩位文學先知者，洞悉跨語言、跨文化的言語表達之困難處，進而努力尋找克服困境的方法。張文環為殖民國家統治下的人民，致力於突破言語的藩籬，意欲流暢地使用統治者語言。而漱石則為同盟國一方的人民，在接觸同盟國英國近代先進文明後，致力於突破言語的藩籬，試圖使日本文化與西洋文化接軌。在面對異文化時的兩位文學家所具有的遠見，正是走在當時時代尖端者擁有的表徵。兩位文學家所採取的突破方式雖然各有差異，但在各自國家的近代化上，所付出的貢獻，卻是有異曲同工、偉大過人之處。環顧現今日本文壇，被視為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明日之星的日本現代文學作家村上春樹（1946～）[23]，曾經表明從事生平第一本小說《聆聽風之歌》創作時，有自己一套獨特的書寫

---

[20] 張文環，〈論台灣文學的將來〉，《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46。

[21] 同上註。

[22] 《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86。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風月報》第 74 期（1938 年 10 月），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此外，《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風月報》前言〉，頁 16，亦有同樣論點的闡述。

[23] 內田樹，〈解說——談論有關極缺乏的東西〉，收錄於加藤典洋，《村上春樹便利冊》卷 2，（幻冬社，2006），頁 254。文中將村上春樹視為當今最有可能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日本作家。

方式，也就是先將自己所思所想用英文寫成，之後再翻譯成日文。據村上春樹本人表示，希望藉此方法排除日語中摻雜的雜質部份，俾利順暢地書寫日語小說[24]。由此可見，膾炙人口的文學創作家，皆是面臨過跨語言、跨文化間「書寫」的大難題。

三、張文環小說創作與日本近代文學作品之交會[25]

當苦惱於跨語言、跨文化的言語表達時，張文環提出「在文章的道路上，可以拿內地人所做的來參考」的主張。或許是其身體力行的緣故吧！張文環小說作品當中，出現了不少日本近代文學名著的投射。逐一比對的結果，整理出以下之對照表：

對照表：投射在張文環小說作品中之日本近代文學作品細目[26]

編號	場景・媒介物的安排	張文環小說名／日本近代小說（影響源）
1	男同伴間談論戀愛 （明仲與義山／甲野與宗近）	《落蕾》別離一／夏目漱石《虞美人草》十七
2	悲嘆女性的不幸的遭遇	《落蕾》別離五／德富蘆花《不如歸》下九
3	人物名稱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少爺》七
4	房東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心鏡》下十
5	水蜜桃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三四郎》一
6	圖書館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心鏡》下四十

[24] 村上春樹，〈本人開始翻譯的地方〉，收錄於雜誌《翻譯的世界》3 月號（芭貝魯布蕾斯，1989），頁 25。該文為他本身論述其創作小說的有名插曲。也因此文壇一直以來，認為村上的文章帶著翻譯筆調。

[25] 垂水千惠，《台灣的日本語文學》，頁 117 中，曾注意到了日本近代文學與台灣文學之關連性。並點出常被日方研究者所忽略一個問題，即是對於明治時代的人而言，與西歐文化的格鬥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問題。而相對於此，對於台灣的知識份子而言，受到日本文化影響的問題，正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問題。且於該書頁 120，大膽地提出了 1900 年代的日本與 1940 年代的台灣，雖然不能完全相提並論，但其所處的現實環境是雷同的。此環境的雷同性，正反映出近代文化衝擊下，人們內心掙扎的一個模式。

[26] 有關具體描寫的全文摘錄，請參考曾秋桂，〈《張文環全集》問世後的種種感想〉。該文收錄於《林丕雄榮譽教授喜壽紀念學術論文集淡江日本論叢》第 16 輯（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2007），頁 139-149。

7	插花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心鏡》下十一
8	彈奏樂器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心鏡》下十一
9	致贈暗戀女子訂婚時的禮物〈手錶與戒子〉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之後》四
10	男主角的通病——神經衰弱症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心鏡》下二十二、下二十七
11	與房東母女一起逛街買東西用餐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心鏡》下十七
12	處於三角關係中的男性的忌妒心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心鏡》下二十七、下三十六、下四十五
13	回家鄉後的落寞心情	《父親的要求》／夏目漱石《心鏡》上二十三、中八
14	生辰與運勢的關聯	《豬的生產》、《辣韮的壺》、《山茶花》／夏目漱石《直到彼岸》「松本的談話」五
15	「作者」一辭出現於作品當中	《辣韮的壺》／夏目漱石『虞美人草』九
16	雷同文字表現——蒼蠅掛在蜘蛛網上	《藝妲之家》一／橫光利一《蠅》一
17	諷刺向金錢看齊的社會現象	《藝妲之家》一／尾崎紅葉《金色夜叉》中第二章
18	用笑來掩飾痛苦的處世態度	《藝妲之家》二／樋口一葉《除夕》上、樋口一葉《十三夜》上
19	早上起得晚的女人	《藝妲之家》三／夏目漱石《道草》三十
20	身為女人的悲哀	《藝妲之家》四／樋口一葉《濁流》一、五
21	女人當戶長	《藝妲之家》四／1888 年樋口一葉當戶長（引用自《樋口一葉事典》櫻楓社 1996 年 497 頁）
22	女性的哀泣	《藝妲之家》四／樋口一葉《濁流》五
23	由於與同儕不合變成特立獨行的人	《藝妲之家》六／樋口一葉《濁流》一
24	希冀脫離現實走向死亡	《藝妲之家》七／樋口一葉《濁流》五
25	雷同文字表現——迎著晨風出航	《藝妲之家》七／谷崎潤一郎《刺青》
26	戀曲修成正果	《闇雞》七／谷崎潤一郎《刺青》
27	日本近代文學作品《金色夜叉》內容的導入	《山茶花》／尾崎紅葉《金色夜叉》

上述對照表中，不難看出張文環的閱讀，遍及各種不同日本近代文學派別。諸如擬古典主義（主導者為尾崎紅葉、樋口一葉為代表）、浪漫主義（德富蘆花為代表）、漱石（高踏派）、耽美派（谷崎潤一郎為代表）、新感覺派（橫光利一為代表）等等。張文環博覽群書以供自淬礪其日語文章時的借鏡。由此可窺得張文環學習日語小說書寫的用心。雖然日後張文環曾經表示，能讓他一讀再讀的日本近代文學作品，僅是農民文學作品長塚節（1879～1915）的《土地》[27]。但是在上述的對照表中，卻未能窺見其蹤跡。其實《土地》該作品是在漱石的催生、激賞[28]之下問世的。又從同時喜愛上《土地》一作的角度而言，再次證明張文環與漱石兩位文學家，英雄所見略同。

再仔細檢視對照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與漱石的關係。投射在張文環小說的日本近代文學作品，明顯地以漱石的作品居多。雖然張文環留日期間，漱石已經是鼎鼎大名的文豪，照常理判斷張文環應該看過漱石的小說。然而同樣是當時有名文豪森鷗外，張文環不但一字也未提，作品中也少投射鷗外小說作品。由此可見，常理的判斷原則的使用是有其極限的。如此一來，更突顯出一一比對，查證其相關性過程之必要性。

張文環曾被《中央公論》選評為選外佳作第二名的〈父親的臉〉[29]（後來改名為〈父親的要求〉發表問世）中，的確有難以抹滅的漱石小說《之後》（1909）、《心鏡》（1914）等的影子。比方說〈父親的要求〉中，男主角陳有義相偕心儀女子名為賀津子的母女倆人，一同到百貨公司買女主角的結婚禮物的場景，簡直就是《之後》中，男主角代助相偕好友平岡一同去買結婚禮物，欲贈與代助暗戀卻即將成為平岡妻子的三千代場景的翻版。在《之後》中，朋友的代助買了珍珠戒子餽贈給朋友的妻子，對此身為丈夫的平岡卻毫不在意，自己也不買結婚戒子而只是買了支手錶贈予給自己的妻子。此番有違常理的餽贈方式的解

[27] 〈台灣代表作家——文藝座談會〉，《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140。該文章為日文，刊載於《朝日新聞》（1942 年 11 月 7、8 日），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28] 漱石，〈長塚節《土》序〉，《漱石全集》第 16 卷（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 491。

[29] 後來內容做了部份修改後，改為〈父親的要求〉的題名，發表於《台灣文藝》2 卷 5 號（1935 年 5 月）。然因為原始稿件遺失，遺憾地無法比對原稿，釐清張文環在構思方面做了何種程度的修改。

讀，在漱石研究者當中，引發了熱烈的討論[30]。此亦正是平岡夫妻結婚後，與代助間發展成明確的三角關係之前，頗耐人尋味之重要關鍵性的書寫。若非張文環仔細吟味出此書寫的奧妙，也不會在陳有義選購暗戀許久卻即將成為別人妻子的賀津子結婚禮物時，唯獨設定「戒子」與「手錶」的兩個選項。由此可見，張文環對漱石文學是有一番的深究與認識。

另外在「父親的要求」中，男主角陳有義寄宿在父親離家出走、母女相依為命的家庭。此簡直是《心鏡》中，名為「老師」的男主角，在遭逢叔父的背叛後離開家鄉，寄宿在父親戰死於甲午戰爭，家中只剩名為靜的女孩與母親兩人相依為命的單親家庭的翻版[31]。學者野間幸信先生認為故事的主軸乃是環繞著張文環自己本身的經歷[32]。但是，加上作品中「少爺」一詞與媒介物「水蜜桃」，導引故事中關係人物變得親密交談的描繪，更令人不得不聯想漱石小說《少爺》（1906）、《三四郎》（1908）[33]的場景。此又添加一樁證據，證明張文環的確閱讀過漱石的小說才是。

雖然在〈父親的要求〉中，局部性地投射了漱石的複數的小說作品。然而張文環從未提及閱讀過漱石文學作品一事。僅在〈懷念平林彪吾〉[34]一文中，輕描淡寫地提到留學日本期間，特別是遷居東京本鄉之後拜訪友人平林彪吾（1903～1939）。友人告知正沉溺於漱石文學的閱讀，並且親眼目睹友人家中桌上陳列著《漱石全集》。而據柳書琴認為，當時的張文環拜訪友人平林彪吾時，

---

[30] 參考齊藤英雄，〈「珍珠戒子」的意義與功能——論《之後》的世界〉，太田登等編，《漱石作品論集成》第 6 卷（東京：櫻楓社，1991），頁 128-140；遠藤祐，〈戒子的去向——論《之後》的故事〉，太田登等編《漱石作品論集成》第 6 卷（櫻楓社，1991），頁 232-241；曾秋桂，《夏目漱石試論》（致良出版社，2002），頁 283-311。

[31] 張文環〈父親的要求〉與漱石《心鏡》作品的關聯，最早由李郁蕙提出。該論文刊載於〈遺孀之家——日本語文學與夏目漱石《心》〉，《台灣文學學報》第六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5），頁 1-18。該論文對於日台通婚多有著墨，與著眼於張文環與日本近代小說間之關連性的本論文主旨迥異，在此不作深論。

[32] 野間信幸，〈張文環的東京生活與〈父親的要求〉〉，《野草》第 54 號（中國文藝研究會，1994），頁 53。

[33] 此「少爺」一詞，雖與漱石小說作品《少爺》內容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令人容易聯想起漱石小說作品《少爺》的篇名。《三四郎》中有一幕，在男主角三四郎吃了火車上不相識的廣田先生所給的「水蜜桃」之後，兩人開始親密交談起來。此與〈父親的要求〉中，女主角給了男主角「水蜜桃」之後，兩人間才親密地開始交談的安排，極為相似。

[34] 〈懷念平林彪吾〉，《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50-51。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4 月 13 日）。

曾提到了自己文學創作上的苦惱[35]。既然看到且聽到給予意見的友人正閱讀著《漱石全集》的話，為了突破自己的創作困境，張文環閱讀《漱石全集》的可能性，是不容置疑的。又加上對照表中比對出張文環的小說中，投射了不少漱石的小說作品的鐵證，更應該可以斷言張文環是閱讀過《漱石全集》。

再者，依據學者野間幸信先生實地考察張文環居住東京本鄉這段時間的生活情況，提出張文環應該沒有去東洋大學上課，而是勤跑圖書館博覽群書[36]的說法，此與一九三五年撰寫〈父親的臉〉小說，投稿於《中央公論》一事發生的時間點，非常相近。由此研判張文環是在這段居住本鄉的期間，大量閱讀《漱石全集》等作品或日本近代文學的作品。同時擬借鏡日本人的文章，努力跨越文化、語言的鴻溝。由此可以清楚得知張文環小說創作與日本近代文學作品的交會，是別具特殊意涵。亦顯示張文環的確身體力行了自己的「在文章的道路上，可以拿內地人所做的來參考」、「以率直的心情，表現自己生活的原貌」的文學主張。晚年時張文環有感而發地道出：「要精通一國的語言，不是容易的事。如果不知道日文的妙處，要翻譯日文是不可能的（中略）讀外國文學的目的，就是在養成客觀的批判力，發現自國的長處。那是從事文學的必經的過程之一」[37]。可見學習日本文學，對張文環而言，也是養成客觀批判力的方法。

四、張文環的文學創作之理念

雖然張文環洞悉生活日據時代的台灣人，要使用日語從事文學創作，將會遭遇到跨文化、跨言語的障礙，而提出拿日本人所寫的文章來參考的解決方案。但同時他也嚴厲地指出「不能模仿」。因為張文環認知到「台灣跟內地不同，有獨特的東西存在」[38]。並且看出當時停滯不前的日本中央文壇，努力尋求「地

[35] 柳書琴，〈從部落道都會：進退失據的殖民地青年男女——從〈山茶花〉論張文環故鄉書寫的脈絡〉，《台灣文學學報》第三期（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頁 87。

[36] 張文環本身亦於 1935 年 1 月 15 日表示，自己是「每天要逃避俗世進入圖書館裏的人」。詳見〈隨筆——說自己的壞話〉，《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4。

[37] 〈江燦琳譯《人魚的悲戀》序〉，《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31。原文為中文創作，刊載於江燦琳譯，《人魚的悲戀》（台北：中央書局，1955 年 12 月）。

[38] 張文環，〈論台灣文學的將來〉，《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44。

方性的東西」。同時台灣文學因受到日本中央文壇的誘導，逐漸產生了些胎動一事，讓張文環感到無比雀躍[39]。當年一九四一年張文環因無法容忍西川滿所主宰的雜誌《文藝台灣》，取材偏向西川滿各人追求異國浪漫氛圍的喜好，及其獨裁風格，憤而離去[40]。在分道揚鑣之後，發行的雜誌《台灣文學》[41]，以及後來編輯的《台灣小說集》[42]中，張文環一貫地實踐了描寫台灣現實的理念，使台灣獨特的東西延續著。

此外，張文環非常重視文學與修身的問題。曾經明白地指出：「文學是建造人類精神的東西，（中略）從事文學之前必需修養人格，（中略）如此一來台灣文學才會誕生吧！誕生的文學自然會成育發展下去」[43]之類，主張創作台灣文學與人格修養是有重要的關聯性。同樣的言論，諸如：「創作文學之前，必須先學會做人的道理。都還不會做人，怎麼會創作文學？」[44]、「文學的路，終究就是人的問題，不是文學的問題。文學因為有一種人性的情感奔流，才會有文學的價值」[45]、「做人成功不成功就這樣子決定。能夠助成這些問題也許就是文學之路。文學不能僅止於口號，必需培育士氣與能冷靜才行」[46]，此正是張文環強調文學創作之前，人格修養的重要，以及透過文學創作，所能發揮的無遠弗屆的效力[47]。此人格修養，其實也是張文環畢生追求的人生的最高準則[48]，觀察他人的重要評價的指標之一。

---

[39] 張文環，〈論台灣文學的將來〉，《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46。
[40] 張文環，〈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64。
[41] 同上註。
[42] 參考了張文環所寫之〈結語〉，收錄於河原功監修，《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 014 台灣小說集》（東京：ゆまに書房復刻本，2000）。
[43] 同上註，47 頁。
[44] 〈從事文學的心理準備〉，《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57。
[45] 張文環，〈我的文學心思〉，《張文環全集》第 1 卷，頁 167。
[46] 同上註，頁 168。
[47] 戰後 1977 年 9 月 16 日給張良澤的書信中，有「由其良知所修養的人是從閃閃有魅力的文學作品產生出來做社會的理想」的敘述。引用自〈張文環先生書簡〉，《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78。該文以中文創作，原載於《夏潮》第 4 卷 4 期（1978 年 4 月）。
[48] 戰後張文環對於林獻堂做了近距離的觀察後，發自肺腑之言道出：「人的價值並不是由其社會地位或頭銜來決定，非看其修養如何不可」。詳見〈難忘的回憶〉，《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39。該文章以中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文藝》第 9 期（1965 年 10 月）。

除了人格修養之外，張文環也注意到要達成台灣文化提升的使命時，迫切需要「自我批判的文化力量」。像是在〈台灣文學的自我批判〉[49]中，張文環將日本與台灣的對比，用「好像內地人都穿著新衣服在顯耀，本島人卻是已經疲憊於二三百年來所受的殖民地的生活了」[50]來做比喻。而在此處境當中，張文環指出「藉由深刻的自我批判，才能使這個島上產生新文化，有了新文化始能把島民的思想，轉向為國家的觀點」[51]。同樣的觀點張文環也應用於內地文化與台灣文化高低的比較之時，提到「內地的文化程度較高，能耐人家批判，也有批判的能力。在台灣批判等於就是吵架的開始。缺乏批判的精神，意味著相稱的文化很貧弱」[52]。同時在面對文學創作時，張文環亦呼籲「沒有比寫作更需要批評力的。其批評力即由自己批判出發」[53]。

綜合上述的言論，可以整理出張文環所架構出的文學創作理念。張文環主張當台灣人從事日語文學創作時，方法即是「在文章的道路上，可以拿內地人所做的來參考，不可模仿」、「以率直的心情，表現自己生活的原貌」。而實際上，張文環從日本近代文學中，多方面地吸收、汲取經驗，海納百川式地努力建構本身文學的理念。而表現的內容則須符合描繪台灣風俗、民情的獨特性。而就文學創作者本身，更需有人格修身的認知，並兼具自我批判的能力，才能使台灣文學遠遠流長。

五、張文環文學形成的歷程

張文環清楚地架構出鮮明的文學創作理念後，文學形成的歷程又是如何呢？張文環活躍台灣文壇的時期，正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展開皇民化運動的時間有所重疊[54]。兩者間所形成關係又是如何呢？此

---

[49] 《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68-70。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新文化》8 月號（1941 年 8 月），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50] 張文環，〈台灣文學的自我批判〉，《張文環全集》第 1 卷，頁 69。

[51] 同上註，70 頁。

[52] 〈例會的妙味〉，《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13。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時報》6 月號（1942），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53] 張文環，〈江燦琳譯《人魚的悲戀》序〉，頁 32。

[54] 下村作次郎，〈從日本回流的〈沙韻之鐘〉的故事〉，收錄於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

將密切關係著張文環文學形成的歷程。於是，繼之將探析張文環與皇民文學的關係。

（一）戰前擁護皇民化運動之言論[55]

在日本留學期間（1927～1938），張文環對於遠從俄國來觀賞日本的「人形淨琉璃」一事，有感而發地道出：「我以為本島人至少也應對通俗的民眾藝術有所理解才是。這也是理解我國國民精神的一個途徑，一個手段」[56]。由「我國」一語觀之，至少在留日期間，張文環對日本是有一定的國家認同[57]。除此以外，張文環於〈親切運動之必要〉一文中，呼籲「做為一個日本人，各個國民理應持有榮譽感與國家理想，相互之間更為親密才對」[58]。此後越是明顯地傾向以日本人自稱、或宣稱台灣人為日本人。例如〈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台灣——論海軍特別志願兵〉中，提到「自從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台灣變得非常明朗了。原因是給台灣青年，做為日本人的矜持與方向有了肯定」[59]。隨之，於〈寄給朝鮮作家〉一文中，更是徹底地獻上「十分惶恐的，說軍人是天皇陛下的股肱。深切感受到這些，我們不得不感泣皇恩的無邊」[60]的恭維後，又再次重申「以往，我們只感覺自為日本一份子的責任，但是今天日本必須痛感於身為世界裡

編，《文學・媒體・文化台灣的〈大東亞戰爭〉》（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頁 188。其中具體定義「皇民化運動期文學」，是自 1937 年 8 月 14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為止的 8 年間。根據下村先生的敘述，整理有關此期間的皇民化運動的大事記，羅列如下：1937 年普及國語於家庭之中、1938 年實施寺廟的整理、1940 年改姓名運動、1941 年 4 月 19 日台灣皇民奉公會的成立、1941 年 6 月 20 日公佈隔年實施志願兵制度、1942 年 3 月制度實施、1943 年台灣文學奉公會的成立、1944 年 9 月局部實施徵兵制、1945 年 4 月全面實施徵兵制。

[55] 柳書琴，〈殖民地文化運動與皇民化：論張文環的文化觀〉，江自得主編，《第一屆台杏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頁 1-43。文中依據豐富資料，精闢地論述，相當具有說服力。結論乃是指向張文環擁護皇民化運動的方向。

[56] 〈教育和娛樂〉，《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4。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4 日）。中譯參考陳明台譯稿。

[57] 「我國」的稱呼，仍可見於 1942 年發表的〈一群鴿子〉中。其敘述為「在一夕之間把英美從東洋趕走的我國皇軍」。詳見《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04。

[58] 《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09。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公論》6 月號（1942）。中譯參考陳明台譯稿。

[59] 張文環，〈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台灣——論海軍特別志願兵〉，頁 157。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公論》7 月號（1943），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60] 〈寄給朝鮮作家〉，《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89。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 1943 年 12 月《台灣公論》，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的一名日本人的使命才行」[61]，強調著台灣與殖民地國日本的一體性。但不可否認，張文環此種自稱為日本人的說法，是隨著戰爭如火如荼地進行、皇民化運動積極地推展的大環境之下，更趨強烈、具體化。

張文環的確是在皇民運動的期間，積極鼓吹皇民文學。諸如在志願兵制度決定實施之際，訪談張文環的內容，以〈三種喜悅：張文環先生談話〉的標題被公諸於世。文中指出張文環因為志願兵制度的實施，而感到「真正適合時宜的英明決斷」、「促進本島精神的迅速昂揚」、「八紘一宇的大精神在台灣明顯的具體化了」[62]等三種喜悅。有關積極鼓吹身為男子漢、日本人為日本國光榮從軍、戰死的態度，約略可從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間的言論中得知。

A.身為男子漢，還是要有一次戰場的經驗。(〈宿營印象記〉[63])

B.既然生為男人，與其死於神經衰弱或患病死於床上，不如扛著鎗去戰場殉職，那是多麼雄壯又有生存的價值啊。(〈一群鴿子〉[64])

C.我們這裏，志願兵制度也施行了，而自昭和二十年度起也要施行徵兵制度。如此，可以跟朝鮮的各位步調一致，做為優秀的日本軍人了。(〈寄給朝鮮作家〉[65])

D.總是會死一次，要受自私我慾苛責而患精神衰弱死去，寧可在大義名分之下倒下去！做一個男人死得多麼有價值喲！(〈征向戰野〉[66])

E.既生為男兒，一生一次必然須為正義而奮戰。何況是為了國家大義名目的這場戰爭，我相信沒有一個日本國民會甘於安閒度日的。(〈臨戰決意〉[67])

---

61 〈寄給朝鮮作家〉，《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90。

62 《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67。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朝日新聞・台灣版》(1941 年 6 月 21 日)，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63 同上註，頁 97。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朝日新聞・台灣版》(1941 年 11 月 26 日)，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64 《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02。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時報》2 月號(1942)，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65 張文環〈寄給朝鮮作家〉，頁 189。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公論》(1943 年 12 月)，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66 《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1。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藝術》5 卷 1 號(1944 年 1 月)，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67 同上註，頁 7。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文藝》1 卷 2 號(1944 年 6 月)，中譯參考陳明台譯稿。

而對於為日本天皇盡忠的皇軍，張文環甚至公開表示「我要向皇軍表示感謝之意」[68]。並且激動地表示「台灣的全島人民，每一位都要成為遂行那樣任務的勇士，不然就是身為日本人的異種羞恥。也無資格搭乘這一艘不沉沒的航空母艦」[69]。端看上述慷慨激昂的言詞，不得不讓人認為，張文環是皇民化運動絕佳的媒體代言人。

（二）戰後批判日本帝國主義之言論

曾幾何時，當戰爭一結束，一九四五年張文環立即發表文章，宣稱戰爭結束是「現實的歡喜」[70]。旋即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出「我們的精神抗戰五十一年」[71]、「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騙局的尺度」[72]、「日本人對殖民地台灣，根本就把老百姓當做沒有娘生養的」[73]等嚴厲的怒吼。針對日本在經營台灣五十年的經濟策略的動機目的，張文環認為「當然是為了他們自己，而不是為了我們。我們似無需表示感謝」[74]。而對於日本在台灣施行的殖民地教育，張文環也認為「只是為了製造工具，不把台灣青年當做一個獨立的人看待」[75]。且不時提醒對於戰後台灣土地問題的解決上，不要「還要踏日人這的惡轍」[76]。此類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嚴厲口吻，真令人瞠目結舌。此與戰前擁護皇民化運動的言論形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轉。

---

68 〈感謝從軍作家〉,《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33。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文藝台灣》5 卷 3 號（1942 年 12 月 25 日），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69 張文環,〈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台灣——論海軍特別志願兵〉，頁 159。

70 〈林文爽與大里庄的土地問題〉,《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16。該文章以中文創作，刊載於《政經報》1 卷 5 號（1945 年 12 月）。

71 〈林文爽與大里庄的土地問題〉，頁 15。

72 〈從農村看省參議會〉,《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26。該文章以中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新生報》（1946 年 5 月 21 日）。

73 張文環〈難忘當年事〉，刊載於《台灣文藝》2 卷 9 號（1965 年 10 月），頁 50。

74 〈台灣新生報社論——給本省青年〉,《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22。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新生報》（1946 年 4 月 17 日），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75 〈台灣新生報社論——給本省青年〉，頁 23。

76 《張文環全集》第 7 卷,〈台拓的土地問題〉，頁 29。該文章以中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新生報》（1946 年 8 月 19 日）。

再次拿出張文環戰前積極鼓吹從軍、成為優秀的日本人的言論，與張文環在戰後談到「日本人是神之子，異民族尚要做日本人需經數十次為日本帝國效勞，用血來作洗禮，才能得到資格」[77]的論調相比，更令人有孰是孰非之錯亂感。張文環在此除了拆穿了日本人皇民化運動的假面具，同時也牴觸到了自己戰前鼓吹皇民化運動言論的誠信問題，以及戰後對日本帝國主義批評的客觀性。的確戰後張文環曾經形容台灣受日本殖民的時代，是「要做日本人既不可能，要做漢民族也難的政治環境」[78]、台灣人共同的「殖民地的悲哀與苦悶的文化」[79]。如此雖然可以為台灣被日本殖民的特殊時代與自己言行不一給個交代，但究竟擁護皇民化運動言論與真實的張文環間之虛實，又是如何？

（三）擁護皇民化運動言論與真實的張文環間之虛實

負責《台灣文學》雜誌編輯的媒體人張文環，戰前積極擁護皇民化運動。而戰後卻對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發出怒吼。其態度之丕變，令人無法置信孰是孰非。而再仔細深入推敲一連串張文環擁護皇民化言論，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整體的方向，重新給予新的詮釋。

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皇民化運動

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張文環即注意到掌握日本精神的重要性。曾經提出「若無法完全了解日本的藝術，也就無法完全把握日本精神。了解民眾藝術，是了解日本藝術的第一步。（中略）帶著一家大小到曲藝場上，邊吃零嘴，邊觀賞表演的滋味，本島人是難以體會的。那裡頭正蘊涵有大集團生活的精神」[80]的見解。返台後，張文環仍不斷聲嘶力竭地疾呼著「我想冀求生活與感情的調和才是文章的任務。（中略）也是內台融合的最好手段。因為要了解文章的本質，畢竟就是跟生活無法脫離的。只要了解國文的好處，對自然和內地人的生活，還

[77] 張文環，〈難忘當年事〉，頁 47。
[78] 同上註。
[79] 同註 77。
[80] 張文環，〈娛樂與教育〉，頁 13-14。

有對我國的各種藝術，都會很快得到了解。（中略）在提昇國文的研究熱度和台灣文壇的水準上，我切實期待會員諸兄的聲援和投稿」[81]。張文環想利用日本文化來提升台灣文化的企圖，是十分明確。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入皇民化運動的時期之後，像是對於在電影院看電影邊看邊吃的大人小孩的舉止，張文環指出「毫不考慮自己的行為會妨礙周圍——做為島都的人民，真對這種事也不感到羞恥？」[82]的缺失。進而對於皇民化劇，提出「希望不要僅做形式，而不能從精神生活加以改變」[83]的願望。可見張文環所思考的理想中的皇民化，應該是能徹底改造台灣人的精神生活層面，繼而提出具體的「在台灣的日本精神運動，也應該逐漸再檢討台灣社會上所有的缺陷，而進行推動才對。這一點，有必要加強文化政策」[84]的建言。並且以皇民奉公運動的一環的「親切活動必須是發自內心的誠心誠意，交雜在生活中鍛鍊出來的一種從容自如的精神」[85]。而身為文學創作者的張文環，「既然文學不是為了逃避現世的精神作業，那麼做為皇民的立場，不得不擔起其任務的一端而推行」[86]而以此自負。最後以「三千年一直繁榮過來的傳統性的靈魂，鍛鍊了日本人形成鋼鐵般的堅定意志」[87]，來對日本的精神下了個註解。對於台灣的教育問題的解決，張文環認知「如果只是單純的教育家氣質來執行是不夠的，還必需帶有宗教家性格的日本精神實踐者才行」[88]。綜觀上述張文環的論調，不難看出張文環重視的是精神層面。目標設定於利用日本精神、日本文化改造台灣文化、台灣人的精神，進而與皇民化運動的主張合為一體，推向極致。

---

[81] 張文環，〈《風月報》前言——文章與生活〉，頁 16。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風月報》69 期（1938 年 8 月），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82] 〈大稻埕雜感〉，《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25-26。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日日新報》（1938 年 12 月 25 日至 27 日），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83] 張文環，〈大稻埕雜感〉，頁 26。

[84] 張文環，〈台灣文學的自我批判〉，頁 69。

[85] 〈親切和笑臉〉，《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29。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公論》11 月號（1942）。中譯參考陳明台譯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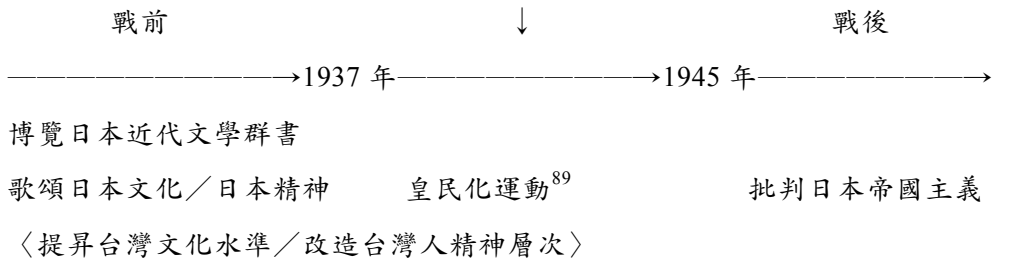
[86] 張文環，〈台灣文學雜感〉，《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56。

[87] 張文環，〈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台灣——論海軍特別志願兵〉，《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58。

[88] 〈燃燒的力量——訪問松岡曹長遺族〉，《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75。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新建設》10 月號（1943 年 10 月），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如此一來，雖然戰前張文環鼓吹皇民化運動，戰後卻對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發出怒吼等截然不同的論點，實在令人錯愕、有昨是今非的感覺。但不論留日期間或於皇民化運動展開之後返台的張文環所發表的言論中，仍可以看出張文環不變的主張。即是透過日本文化提升台灣文化、改造台灣人精神層面的主張。本人將此錯綜複雜的關係，簡單地用圖（一）來表示：

圖（一）張文環所構思皇民化之心路歷程



堅持利用日本文化、日本精神，來提昇台灣文化水準、改造台灣人精神層次，是嚴酷時代巨輪下，張文環不變的執著、堅持的理想。張文環此思考模式，不外乎是鹿子木龍評論家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只按部就班的去掌握，還要透過日本精神來達到完全通曉日語的境界」[90]。在此模式的努力之下，張文環試圖使台灣能夠承襲並達到日本近代化的文明[91]。於是張文環畢生努力的文學歷程，可以用「日語化→日本化→皇民化→近代化」的流程來定調。相對於此，據垂水千惠指出同時代另兩位台灣文學作家周金波、王昶雄的文學歷程，則不盡相同。周金波的情形為「皇民化→日本化→近代化」。而王昶雄則抵死不從皇民化，僅為「日本化→近代化」[92]。從與同時代的作家的對比中，更明顯地看出張文環具有真知灼見，注重跨語言、跨文化的書寫障礙。並著手借鏡日本人

[89] 依據上述下村作次郎〈從日本回流的〈沙韻之鐘〉的故事〉論文中的主張。
[90] 鹿子木龍，〈作品和文章——關於散文水準的提昇〉，《張文環全集》第 8 卷，頁 43。
[91] 張文環，〈我的文學心思〉，頁 165 中，有如下的敘述：「如果台灣沒有文化，那麼從日本內地這支樹幹伸出來的台灣樹幹，會形成怎麼樣的姿態呢？這是不難想像的，這一點台灣地方文化的任務相當重大。日本吸收了世界各方面的文明，而予以消化，磨亮過二千六百年來的文化。這一樹枝的台灣，從樹幹流來的養分，誰會相信台灣的土地不會湧出文化來？」
[92] 垂水千惠，《台灣的日本語文學》，頁 168。

的日語文章，來學習體認日語的感覺，進而學習日本文化、日本精神，提昇台灣文化水準並改造台灣人精神層次。此目標正巧與皇民化運動強調的精神改造層面，不謀而合。

2、張文環的處世態度

試著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張文環一開始就打從心底想積極配合皇民化運動的話，大可率先為民表率更改姓名，當個名符其實的日本人，更能達到皇民化運動的效益。而事實上張文環自始至終沒有改過姓名。單就這一點，張文環極力擁護皇民化的論調，就更值得再三斟酌。

以下分成四點，探究張文環的處世態度。

第一點：巧妙地規避阻礙，爭取延續作品生命的機會

如前面張文環提過：「要精通一國的語言，不是容易的事。如果不知道日本文的妙處，要翻譯日文是不可能的」[93]。而張文環一生中曾經翻譯過《可愛的仇人》。透過翻譯的高難度工作，傳達出張文環另一處世態度。野間信幸先生曾經比對原著與翻譯成品間的差異，分析出張文環的態度。最主要的一點，乃是張文環捨棄翻譯領域中堅持的最高原則「忠於原意」，為了保住翻譯作品問世的機會，雖冒著向皇民化運動靠攏之嫌，而刪掉了不少描寫漢民族意識的地方。但終究還是得以讓作品問世[94]。如此地夾縫中生存的認知，可稱得上其過人之處。

第二點：對於改姓名之事，巧妙迴避，智勇雙全

戰爭方興未艾之際，台灣興起改姓名的旋風時，張文環不會去反對他人改姓名，但個人也不改姓名[95]。甚至在池田敏雄先生的回憶中，提到張文環搬出

---

[93] 張文環，〈江燦琳譯《人魚的悲戀》序〉，頁 31。

[94] 野間信幸，〈關於張文環翻譯的《可愛的仇人》〉，《張文環全集》第 8 卷，頁 85。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 17 號（1966 年 3 月），中譯參考陳明台譯稿。

[95] 〈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73。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2 號（1979 年 8 月），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八紘一宇」、「大丈夫之道」為憑藉，讓前來說服改姓名的憲兵無言以對[96]。因張文環的辯才，巧妙地擊退強勢，逃脫了憲兵的監視，此舉可謂智勇雙全。

第三點：以不得罪但不屈服的態度，周旋於有力人士之間

日本殖民帝國的御用作家[97]西川滿，曾經在雜誌《台灣文學》出刊前夕，前來阻撓張文環出刊雜誌《台灣文學》一事[98]。此事發生在先，而當雜誌《台灣文學》創刊號問世時，張文環卻於〈《台灣文學》編集後記〉中，明白地寫上「本刊創刊之際，有負西川滿（中略）諸兄之處甚多，謹此致謝」[99]一筆。可見張文環在面對既不能得罪又不想屈服的人時，處理手法之圓融、高明。此外，連極其卑躬屈膝地歌頌皇恩的〈寄給朝鮮作家〉一文中，張文環巧妙地於文章結束之前，加上「遵照本誌命令，匆忙提筆寫下，不過似乎沒有特別的內容，寫完了心裏覺得很空虛」[100]，一語道盡被動受命、言不由衷、附和的心情。

第四點：大局為重的明哲保身態度

當台灣皇民奉公會主辦的會議上，進行到討論廢除《文藝台灣》、《台灣文學》，統籌由皇民奉公會發行的《台灣文藝》的議題時，贊成與反對雙方激辯當中，見到大勢不能挽回時，張文環站起發言道說：「在台灣沒有非皇民文學，假如有寫非皇民文學的傢伙，則該槍殺」[101]一語，化解了危機，妥協退讓，顧全大局。此可視為張文環能屈能伸、明哲保身的睿智表現。誠如事後台灣人只有張文環一個人參加《台灣文藝》的編輯委員會議時，張文環有感而發地說出了

---

[96] 池田敏雄，〈張文環《台灣文學》的誕生」後記〉，《張文環全集》第 8 卷，頁 65。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2 號。中譯參考陳明台譯稿。

[97] 此「御用作家」，雖然不盡符合現代研究潮流的用語，但此乃張文環本身所用的字彙，詳見於〈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張文環全集》第 7 卷。為忠於作者原意，本人在此不做任何修改。

[98] 其經緯詳見張文環，〈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頁 65。

[99] 〈《台灣文學》編集後記〉，《張文環全集》第 7 卷，頁 88。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 年 5 月）。中譯參考陳明台譯稿。

[100] 《張文環全集》第 6 卷，頁 192。該文章以日文創作，刊載於《台灣公論》（1943 年 12 月），中譯參考陳千武譯稿。

[101] 《文藝台灣》昭和 19 年 1 月號，收錄於《新文學雜誌叢刊 16》，頁 34-35。欲比較雙方論述立場之不同，可以參酌〈議事記錄〉，《文藝台灣》終刊號與《台灣文學》第 4 卷第 1 號。

「一個對十幾個人，能夠做甚麼？發表意見等於愚蠢的行為」[102]的真正心聲。諸如此類不正面迎敵，卻僅消極配合的明哲保身的表達方式，不得不令人懷疑張文環其真心擁護皇民化運動的程度。易言之，張文環洞察時勢不我予，而僅委屈求全地選擇配合當權者政策罷了！

綜合上述四點的張文環處事態度，張文環與自身在戰前發出擁護皇民化運動的言論間，不見得全是發自肺腑之言。從中不難體會出，張文環表面積極配合皇民化運動的演出，其實內心不見得是完全如此的想法。試想在那樣張文環所形容的「有一萬個甘地在台灣還是沒有辦法」[103]的帝國殖民強權時代，除非拋頭顱、灑熱血積極反抗革命以外，或低聲下氣、消極以對之外，還有其他能夠使生命獲得最低程度保障的延續，為台灣這塊土地的文化做貢獻嗎？從結果論看來，張文環是選擇了使生命獲得保障的前提下，來為台灣這塊土地的文化做貢獻。

縱觀張文環言論以及處事態度，可以看出張文環與擁護皇民化運動的虛實之間，自有其邏輯存在。張文環擁護皇民化運動論述，目的乃透過日本精神的薰陶，進而意欲將台灣文化推向近代化，提昇台灣文化與人民的素質、精神層次。

六、結語

誠如前言所述，葉石濤先生認為台灣文學家當中，張文環文學價值有再受公評的空間，而其先決條件在於是否是能通過皇民文學與否的考驗，此舉足輕重的發言點出一點，國族論述牽絆了其文學價值的論斷。依據國族論述的觀點，檢視是否為皇民文學，的確有其必要性。然太過於拘泥於是否為皇民文學的爭論，只會爭論不休，恐怕少有建設性的發現。先正視張文環留日經驗豐富，且其小說作品中投射了許多日本近代文學作品的事實，如此地與日本近代文學接軌，抽絲剝繭地剖析張文環的心路歷程，再回頭反思國族論述下張文環文學活動的意義。

---

[102] 〈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頁 70。
[103] 張文環，〈難忘的回憶〉，頁 38。

張文環有別於其他台灣文學家，和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石一樣陷入極度的跨語言、跨文化書寫的苦惱之中。為了突破困境，張文環嘗試以日本人寫作為參考，如實地寫出自己生活點滴。歷經〈懷念平林彪吾〉的雜記與小說〈父親的要求〉仔細比對後，可以確定的是張文環留學東京居住本鄉時，是看過《漱石全集》等作品或其他日本近代文學作品。日語化繼而日本化，可謂一九四〇年代之前張文環努力朝向的目標。

而一九四〇年代如火如荼地推展的皇民化運動中，張文環以媒體公眾人物的身分，的確適時適地配合推展，宛然以皇民擁護者的姿態出現各式公共場合，發表支持的言論。然而對照戰後立即對日本帝國主義毫不留情地批判，以及皇民運動中堅持不改姓名的作為，張文環應該公開擁護皇民運動之外，內心自有另外主張。洞察張文環言談間，發現不斷強調人格、修身、自我批判精神以及台灣獨立的重要，由此不難看出張文環的真情流露與真正主張，其即為透過皇民化改造、提升台灣人民素質與台灣文化臻至於近代化。

時代洪流之下，台灣走過日本帝國的殖民。身為被殖民中的一份子的張文環於巨變的洪流當中，雖有不同風貌的展現，但有不變的主張，即是張文環想承襲日語化進而日本化，繼之皇民化而迎向台灣的近代化一貫主張。此乃是跳脫出皇民文學與否的國族主義的論述，與日本近代文學接軌後，獲得的對張文環文學活動重新詮釋與評價。